

江南丝绸史研究

范金民 金文 著

农业出版

2

6



此项研究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

江南丝绸史研究

范金民 金文 著

农业出版社

(京)新登字 060 号

江南丝绸史研究

范金民 金文著

责任编辑 穆祥桐

农业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北路 2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农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850×1168mm32 开本 12.625 印张 10 插页 315 千字

1993 年 10 月第 1 版 1993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册 定价 17.50 元

ISBN 7-109-02754-6/TS·41

序 言

我以非常喜悦和钦佩的心情，读到了范益民、金文两位青年作者的近著《江南丝绸史研究》一书，这是迄今为止，将区域经济史与行业经济史有机结合起来的第一本关于江南丝绸史的著作。中国自古以来，即被称为丝绸之国，丝绸业的生产，对我国的社会经济、政治、海内外贸易以至文明发达各个方面，均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系统地有重点地对之进行深层次的研究，无疑是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半个世纪以来，对丝绸史的研究已有过一定的论著，但由于学术讨论日益深入，加以新资料的不断发现，亟有待于在原有基础上进行新的探讨和提高。范、金两位的著作正是应此需要而成书的。我展读原稿后，觉得本书既能有批判地继承前此的研究成果，又能作出重要的充实和创新，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

本书具有一些显著的特点：

首先，本书是从历史发展的源流，从纵的方面观察江南地区丝绸业的始创、发展和发达的过程，摸清其演变脉络，从而说明全国丝绸业生产逐渐集中于江南并非偶然的巧合，乃是决定于一定的历史条件、地区环境以及社会诸方面原因的。当然，丝绸业的发展又从来不是一项孤立的可以游离于各该时代社会总体的事业，它大体上是与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同步。作者充分注意到这一点，简要地叙述了先秦时期江南丝绸业的起步，后因隋唐封建社会的繁荣而崛起，又因南宋以后全国经济中心南移，经济作物种植普遍、作为农学分支的蚕桑学科水平的提高，人们生活习惯趋向的变化，海外贸易的开拓，促成了江南作为丝绸业中心的地

位，历元、明、清而极盛。上述论断不但符合历史事实，而且有理有据，令人信服。本书在篇幅分配上，也能够做到详略得宜，一以历史的实际情况为依据。宋代以前由于丝绸业还处在初期发展的阶段，故在内容上仅占全书九分之一左右，而两宋以后，特别是在明清时期，由于丝绸业已在江南经济中，包括农业、手工业、商业各方面均上升为首要的或重要的地位，在内容上必须进行细致的分析论述，故占用了全书约九分之八的篇幅。这样有重点地使用力量，以求较透彻地说明重点段落的重点问题，应该是可取的。

其次，本书作者在本专题的研究和写作中，一直保持着尊崇实学，既勇于探讨但又不躁进求成的良好学风。两位作者都曾较长期地对江南丝绸史进行过较系统的研究，或先后发表过二三十篇有关论文，或对古丝绸的修复、鉴定作过大量的工作。本书是在较长期刻苦钻研，在较大量资料和成果积累的基础上汇合成书的。特别是，两位作者，其中之一是南京大学的史学教师，另一则是南京云锦研究所专门研究古代纺织工艺的工程师，他们的合作也是历史科学与古工艺、古文物科学的结合。这样的合作是值得提倡的，特别是在社会经济史各行业的研究中，两方面人才的配合，两方面成果的结合，是必不可少的。

在史料的搜集和利用方面，也说明作者的刻苦踏实。在本书各章中，引用了大量的田野考古报告、官书、政书、文集、地方志、碑刻拓片、历史档案等等资料，参考了历年海内外有关论著。历史科学本来就是研究既往事实的科学，对一切可能得到的史料尽可能竭泽而渔地搜集到手，然后一一进行比较订正，爬梳整理，然后精心筛选使用，乃是一个严肃的史学工作者必应遵循的基本工作原则。作者在本书的研究写作中确实做到了这一点。仅以利用明清历史档案来说，作者之一范金民同志近年四度奔走于北南两京，在第一历史档案馆认真利用有关档案，不但采用了大量的题奏章疏，并对之进行量化分析，从而较深入地弄清楚了

明清时期的官私织造业的兴衰演变、生产形式和生产格局、官方对国内外丝绸贸易的控制和管理等等，此在本书第7~11章均有明显的反映。本书之所以获得成功，是与基础工作坚实直接有关的。

当然，任何一部著作都不可能尽善尽美，任何一种学术论断都不可能不存在异议，任何学术成果都必然要经过辩难和接受时间的考验，只有能经历得起严峻考验的成果才具有真正的学术价值和学术生命力。我相信本书是经得起上述严格检核和推敲的。

对于本书基本论点，我本人是同意的，但也对其中个别论点有所保留，例如，作者在不止一处强调自明代后期之后，全国蚕桑业都不同程度的衰落，只有江南地区不但没有衰落，反而更形发展，走向极盛，等等。窃以为，此说仍可斟酌。诸如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自明以来即发展了“桑基鱼塘”的生产模式，蚕茧可以一年七八收，手工缫丝业遍及城乡。粤丝粤绸不但占领了两广市场，且有部分输出外洋。乾隆《广州府志》引嘉靖《广州府志》说，“广纱甲于天下，缎次之”。即使“甲于天下”的说法失于浮夸，但珠江三角洲地区丝绸业生产也差不多是从明初趋向繁荣兴盛的。进入近代以来，当地使用机器进行缫丝，第一个作为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缫丝厂（继昌隆缫丝厂）也是首先在当地出现的。我认为，在充分肯定江南丝绸业的领先地位的同时，也可以适当考虑其他地区的情况。一得之见，不一定正确，仅供范、金二位参考。

是为序。

韦庆远

1991年10月于北京师韵书室

前 记

本书所说江南，北界长江，南临杭州湾，东濒海，浩瀚的太湖镶嵌其中，大体相当于长江三角洲范围，包括今南京、镇江、常州、无锡、苏州、上海、嘉兴、湖州和杭州1个直辖市、8个省辖市的区域，面积四万多平方公里。工农业总产值和财政收入分别占全国的八分之一和六分之一。

江南在历史上为《禹贡》扬州域。春秋属吴，战国属越。秦属会稽郡、彭郡，汉属丹阳郡、会稽郡等。三国吴晋南朝及隋属丹阳郡、吴兴郡、吴郡。唐属江南道，奄有升、润、苏、常、杭、湖6州。北宋属江南东路和两浙路，包括江宁、平江、镇江3府和杭、湖、常、秀4州，南宋属江南东路和浙江西路，包括建康、临安、平江、镇江、嘉兴5府和安吉、常州2州及江阴一军。元代属江浙行省的江南浙西道和江南诸道御史台，包括杭州、湖州、嘉兴、平江、常州、镇江、松江、江阴和集庆9路府州。明属南直隶和浙江布政使司，包括应天、镇江、常州、苏州、松江和杭州、嘉兴、湖州8府，清太仓州由苏州属州上升为直隶州，为8府1州。

这区区9府州之地，是唐宋以来全国首屈一指的重赋区。以明代论，全国2944万石税粮中，江南达668万石，占了将近23%。以清代论，地丁银两占全国10%强，漕粮占34%强。而江南赋税的重要地位又与该地丝绸生产的发展相一致。溯源于远古、崛起于唐末的江南丝绸，到宋代三分天下有其一，到明清时期则蚕桑之盛，丝绸数量之多，质量之优，品种花样之繁，用途之广，在海内外声誉之隆，为全国任何一地所不及。当经由秦陇

古道通向中亚、欧洲的陆上丝绸之路的驼铃声逐渐消失后，满载江南丝绸的帆船就日益奔忙在海上丝绸之路上。直到现在，江南丝绸仍是我国对外出口的重要商品。从这个意义上说，研究中国的丝绸发展史，江南是一个关键地区；研究江南经济史，丝绸是一个重要领域。

江南丝绸地位如此重要，所以历来为人所瞩目。国内大陆学者有彭泽益对于明清江南官民营丝织业的系统研究，魏东对于中国蚕业起源的探讨，赵丰对于唐宋杭州丝绸的研究，张学舒对于两宋民间丝织业的研究，章楷对于明清江南蚕桑业的研究，段本洛对于近代苏州丝织业的研究，徐仲杰对于南京云锦的研究，陈娟娟对于丝绸技术的研究，陈学文、樊树志对于江南市镇丝织业的研究，徐新吾对于清代江南缫丝业的研究，严中平、张铠对于江南丝绸远销拉丁美洲的研究等；台湾有施敏雄对于清代丝织工业的考察，陈慈玉对于近代江南生丝出口的研究等；香港有全汉升对于中国丝绸输向新大陆等地的系列研究。国外如日本有佐伯有一对于明代机户的研究，田中正俊对16~17世纪中国农村丝织业和帐房制的研究，横山英对于清代城市丝织业的研究，波多野善大对于清代丝织业的研究等；美国有孙任以都（Sun, E-tu Zen）对于清代丝织业的描述，李明珠（Li llian M. Li）对于近代生丝出口的研究，伍若贤（Robert Y. Eng）对于近代上海丝业的研究等。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文博专家宋伯胤先生于50年代后期对于南京、苏州和盛泽等地丝织业的访问和实地调查，提供了大量难得的宝贵资料；业师洪焕椿先生整理的苏州丝绸碑刻和其他城乡丝绸资料，泽被后学不浅；明清史专家陈学文先生搜集的杭州丝绸碑刻和嘉兴、湖州丝绸资料，嘉惠学林良多。

上述学者的丰硕研究成果，为我们奠定了进一步研究江南丝织业的坚实基础；他们提供的大量资料，使我们得以开阔眼界，提出一些新的问题，获得一些新的认识。在中国丝绸的起源问题上，前人或主黄河流域，或主长江下游，我们认为两者都是中国

丝绸的发源地，不能顾此失彼，厚此薄彼。在中国丝绸中心问题上，前人多主张有一个逐渐南移的过程，而到南宋完成，我们认为江南在宋代只是全国丝绸生产的三大中心之一，并不是唯一的中心，这种中心地位的形成，并不是由北转移过来，而是其本身发展赶上或超过其他地区的结果。在明清官营织造的生产规模问题上，我们认为就总体来说，明代中央和地方织染局明显大于清代，但就单个织染局来说，无论从织局规模、机张设置，还是匠役人数、生产量，清代都明显超过明代。在丝织业的生产形式问题上，我们认为“买丝招匠”与“领机给帖”并不是长期来如人所说的是两种制度，实际上两者是一回事。明清江南官营丝织业的生产形式，由明前期的徭役局织制到明中后期的局织与领织并存，再递变为明末清初的金派制，发展定型为后来的雇募局织制；民间丝织业除了家庭手工业的自给自足或小商品生产外，由明后期的简单协作发展到清前期的简单协作与包买主制相并存，并逐渐被后者占优势，形成江南丝织业资本主义史前期的特征。在官民营丝织业的关系问题上，历来人们过份强调官营织造对民间丝织业的消极阻碍作用，实际上它们是互为影响的，官营对民营既有阻碍发展的消极的一面，也有促进发展的积极的一面，不能一概而论。清代的“贸易绸缎”，国内外学者一直认为是由江南三织造生产的，是一种“供给”新疆少数民族头人的“俸缎”，而我们认为它是由民间生产、经官局采办而解往新疆供贸易用的商品性绸缎。对于人们几乎从不涉及的明清江南绸缎生产量及其商品量，我们也作了估算。在明清丝织工艺问题上，人们多主张织造机具到明后期后再无大变化，我们认为不但在明后期有了斜身式小花楼织机，以后更向斜身式大花楼机发展。

我们也认为，以往的研究成果虽然丰硕，但还远没有揭示江南丝绸发展的全貌，缺乏系统性；资料虽较丰富，但档案、实物等大量第一手材料还没有充分挖掘和利用，有于材料的不足和先入为主的观念，对不少问题的把握还不够准确，甚至与实际出入

极为悬殊，在有些问题上，人云亦云、以讹传讹的现象也严重存在；史家和技术专家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历史和工艺两者有机结合的丝绸成果还很少见；如果仅就江南而论江南，仅就某朝而论某朝，江南丝绸的研究就很难深化。有鉴于此，我们自始至终试图以全国丝绸的发展为背景来考察江南丝绸的地位，运用载籍和实物，循着官营和民营两条线索，从历史和技术生产两个角度，探讨和论述江南丝绸的发展演变。这种努力很不尽如人意，是否成功，毫无把握。上述表述是否准确，结论是否可靠，也有待行家睿鉴。

书稿草成之日，脑际时时浮现起先师洪焕椿先生的音容笑貌。先生生前多次叮嘱完成此稿，本人生性笃钝，稍延经年，合南京云锦研究所工程师金文之力（第十二章由两人共同撰写，其余11章由笔者勉力完成，丝绸实物照片主要由金文搜集），才勒成此篇，未知可否稍慰先生在天之灵。

多年来，在本课题的研究中，承蒙本系罗仑、陈得芝、魏良弢教授，北京大学历史系许大龄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王戎笙、周绍泉研究员和经济研究所彭泽益、方行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韦庆远教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朱金甫研究员等师长的教导、鞭策、关心和支持，谨向他们致以深深的谢忱和敬意。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部，是我查阅资料最为经常的地方，该馆蒋一斐老师及全体工作人员年复一年，不厌其烦，为笔者提取书籍，盛情感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阅览条件优越，笔者四度前往查阅有关档案，或来去匆匆，或兼旬连月，馆中人员优礼相待，令人难忘。本系资料室，任从翻阅，甚为便利，时有所得。北京图书馆古籍特藏部、普通线装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资料室，上海图书馆古籍部，苏州历史博物馆、碑刻博物馆、档案局，南京博物院等图书文博部门，都为笔者搜集资料提供了方便。对上述单位及有关个人的大力帮助，笔者十

分感激，谨此致谢：美国国会图书馆居蜜博士、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黎志刚博士、宾州斯瓦斯摩学院历史系李明珠教授，日本弘前大学人文学部井上彻教授、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小野和子教授、日本大学经济学部小岛淑男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刘石吉研究员等海外学者，都曾不辞劳苦，费时费金，为笔者查找复制相关资料，笔者深受感动，一并深致谢意。

范金氏

1991年国庆节

于南京大学历史系

目 录

序 言

前 记

第一章	源远流长的江南丝绸业	1
第二章	南朝前江南丝绸业的起步	4
一、先秦时期的江南丝绸业	4	
二、秦汉吴时期的江南丝绸业	7	
三、两晋南朝时期的江南丝绸业	10	
第三章	十国前江南丝绸业的崛起	18
一、隋唐江南丝绸业	18	
二、南唐江南丝绸业	24	
三、吴越江南丝绸业	26	
第四章	宋代江南丝绸业中心地位的形成——兼论中国 丝绸中心南移论	30
一、蚕桑生产迅速发展	30	
二、丝绸生产全面展开	36	
三、江南丝绸的生产形式	44	
四、丝绸贸易崭露头角	49	
五、江南丝绸在全国的地位问题	54	
第五章	元代江南丝绸业由中心向重心地位的过渡	62
一、蚕丝生产的新发展	62	
二、民间丝绸生产的普遍化	66	
三、官营织造业气势宏大	71	
第六章	明清时代江南蚕桑生产的特点	78
一、全国蚕桑生产最盛的地区	78	
二、蚕桑生产的商业化与专业化	87	

三、战后蚕桑生产的新格局	95
第七章 明代江南兴盛的官营织造业	102
一、中央织造机构考述	102
二、江南地方织造业的兴盛	114
三、江南地方织染局生产形式的演变	124
四、不同生产形式下机户的待遇	130
第八章 鼎足而立的江南三织造	138
一、清前期江南织局的生产形式	139
二、清前期江南织局的生产格局及其生产量	149
三、清后期江南织造的演变	173
四、江南织局对民间丝织业的影响	187
第九章 明清时代江南民间丝织业的发展	196
一、民间丝织业的发展阶段	197
二、民间丝织业的生产方式	209
第十章 明清时代江南丝绸的国内市场和对外贸易	236
一、广阔的国内市场	236
二、兴盛的对外贸易	261
第十一章 “贸易绸缎”的历史考察	301
一、丝绸贸易始末	301
二、贸易绸缎的数量及其地区分配	310
三、贸易绸缎的品种与色彩	318
四、贸易绸缎的来源	325
五、贸易绸缎与丝绸贸易的性质	333
六、丝绸贸易的作用与影响	341
第十二章 明清时代江南丝绸的工艺技术和品种色彩	349
一、织机的改进	349
二、花本的挑结	358
三、品种的创新	361
四、纹样的丰富题材	376
五、色彩的变化及染色方法的进步	381

第一章 源远流长的江南丝绸业

江南地区的文明史，可以追溯到 7000 年前的河姆渡文化。毗邻江南、位于宁绍平原的河姆渡文化遗址，既是江南文明最早发祥地的象征，又是江南丝绸的源头。

1973 年和 1977 年，浙江省文物考古工作者在河姆渡发掘出了大量的生产工具和动植物遗物，其中有打纬骨机刀、骨梭、梭形器、木制绞纱棒、打纬刀、经轴(残片)和陶制纺轮等原始纺织工具。这些文物，经测定距今约 7000 年。同时出土的一个盅形雕塑器，上面刻着四条蚕纹，看起来就像蚕在向前蠕蠕移动，头部和身上的横节纹非常清晰。绘有昆虫食叶纹的残陶片上的幼虫，弓背屈体，沿着叶缘吞食，形象逼真^①。出土的若干纺织工具，说明当时已有原始的手工编织劳动。由盅形雕塑器上所刻蚕纹，可以推知生活在原始桑林间的野蚕，已为江南地区的先民所认识。甚至有学者认为，“河姆渡人已经完成了认识野生茧丝昆虫阶段，距利用野生茧、丝昆虫已为期不远了”^②。

到了距今 5000~4000 年良渚文化时期，江南地区又发现了重要的蚕业遗存。1959 年冬，江苏省文物工作队和苏州市文管会在吴江县梅堰镇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掘出土和采集了遗物四千一百余件，其中有扁平圆形的纺轮 7 件，出土的一件纺轮直径 65

① 浙江省文管会、浙江博物馆：《河姆渡发现原始社会重要遗址》，《文物》1976 年第 8 期；《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 年第 1 期；河姆渡遗址考古队：《浙江河姆渡遗址第二期发掘的主要收获》，《文物》1980 年第 5 期。

② 魏东：《略论中国养蚕业起源于长江三角洲》，《中国农史》，1983 年，第 1 期。

厘米,厚1厘米;在出土的陶器的纹饰上,有两条蚕的蚕纹^①。蚕纹运动形态十分平稳,没有明显的弓背,与河姆渡遗址出土的蚕纹相比,有着明显差别。因此有人认为,“从外形看,更形似家蚕”^②。

1958年,浙江省文管会和浙江博物馆又在吴兴县钱山漾两次发掘了与梅堰遗存大约同时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丝线、丝绳、麻布、稻谷、细麻绳、棕丝刷子,以及盛有绢片、丝线、丝带和麻布片等物的竹筐^③。经对同层同时出土的其他物品测定,年代为公元前2735~前2175年。1960年,浙江省纺织科学研究所和浙江丝绸工学院先后多次对上述遗物验证鉴定,由鉴定结果可知:钱山漾遗址出土的绢片是以家蚕捻合的长丝为经纬交织而成的平纹织物,其表面细致光洁,丝缕平整^④。这是我国乃至全世界迄今为止出土最早的丝织品,显示出江南地区的先民在5000年前就已完成了从认识野蚕、利用野蚕茧丝到驯养家蚕并用以缫丝织绢的历史过程,在世界丝绸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为世人所瞩目。德国学者赫伯特·佛格勒(Herbert Vogler)高度评价道:“钱山漾发掘的古文物显示,中国人的纺织技术在公元前3000年就已发展到了一个相当完善的水平”^⑤。法国学者Balize在他的《蚕丝史》中说,“太古时代,蚕丝业仅行于中国,其它各国从未之有”。日本学者针塚长太郎在其《日本蚕丝业史》中也说,“中国为世界蚕丝业史上有最古历史之国家”^⑥。

长期以来,不少人依据黄帝元妃西陵氏女螺祖发明育蚕的传

① 江苏省文物工作队:《江苏吴江梅堰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63年第6期。

② 见前引魏东文。

③ 汪济英、牟永杭:《关于吴兴钱山漾遗址的发掘》,《考古》,1980年,第4期。

④ 参见朱新予主编:《浙江丝绸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2~3页。

⑤ 佛格勒:《古代中国的染色》,转引自《丝绸史研究》,1990年,第1期,第45页。

⑥ 转引自施敏雄:《清代丝织工业的发展》,台湾商务印书馆,1968年。

说和 1926 年在山西夏县西阴村出土的半个蚕茧以及后来陆续出土的其他实物,认为只有黄河流域才是中国养蚕的起源地。从河姆渡文化到钱山漾文化遗址的一系列有关丝绸实物的出土,说明同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都是中国文明的发源地一样,长江下游与黄河中游同样都是我国养蚕缫丝织绸的发源地,而且从目前掌握的有关材料来看,前者还要早于后者。不能因为在随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前者的蚕桑丝绸业没有后者发达,就认为只有后者才是中国养蚕的发源地,但是同样也不能因为前者的出土蚕丝实物相对早些并较为连贯,就否认后者的蚕桑起源地的地位。

第二章 南朝前江南丝绸业的起步

自夏商周三代，经秦汉吴晋到南朝，江南丝绸生产经历了由中落到起步的历程。秦汉以前，由于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中心一直在北方，江南丝绸业在其史前时期的大放光彩后，由先进逐渐退居落后地位，极不景气。三国吴时蚕桑业得到重视，江南地区首次出现了官营织造机构，丝绸业从生产到外贸、从生产规模到技术水平，都开始有了起色。经过西晋的短暂萧条后，江南因地利之便，官营织造机构在南朝历代设立不断。官营丝织业和民间丝织业一起，构成了南朝江南丝织业的重要篇章。品种创新，产量增加，质量提高，国内贸易和对外交往丰富多彩。虽然吴国时锦类织物需要从西部的蜀国输入，南朝时丝织水平仍远远落后于北方，但所有这一切，表明江南丝绸业在各个方面都已开始起步。从此以后，江南丝绸业循着自己的方向不断发展。

一、先秦时期的江南丝绸业

进入阶级社会后，古代先民栽桑养蚕的活动已有了明确记载。相传《夏小正》是夏朝的历书。该书记载，“三月，摄桑……妾子始蚕，执养官事”。这个记载既反映了夏人对蚕桑生产的重视，也表明当时已有专门的蚕室和相应的养蚕设备。《左传》哀公七年记载，“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据说位于今浙江武康境内的防风氏也曾执玉帛去朝见夏禹，因后至而被杀。这些传说和记载，反映了江南地区和黄河流域一样，早在夏代，丝绸生产已可考见。